

燭火叢書 2

古遠清 自選集

古遠清著

馬來西亞燭火出版社出版

古遠清自選集

古遠清 著

馬來西亞燭火出版社

**責任編輯：甄 供
封面設計：葉玉佩
校 對：熾珍、紅纓、竹青**

古遠清自選集

古遠清 著

**出版：馬來西亞爝火出版社
SEMARAK PUBLISHING
5, Lorong Ramah,
Happy Garden,
58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印刷：益新印務有限公司 (45169-K)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2589211 Fax: 62570761**

版次：2002年5月第1次印刷

**定價：RM 60.00 (馬幣)
或 US\$ 20.00 (美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為世界華文文學奉獻一束鮮花

——《古遠清自選集》序

馬來西亞董總署理主席 葉新田

《古遠清自選集》所收集的文章相當廣泛。從地域方面來說，它包括對臺港澳文藝的評論，大陸文學概況的評述，海外華文文學篇則包括了東南亞地區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泰國等地的作家作品評論。從內容方面來說，有文藝運動的觀察，有對文藝思潮的評介，有對文學現象的剖析，有對史料的辨誣與訂正。涵蓋內容及地域如此廣泛，由此可見古遠清研究視野之寬廣與掌握資料之豐富和全面。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不僅中國海峽兩岸處於隔膜狀態，而且東南亞國家與中國亦曾一度在文化交流上中斷，華文文學也因此處於孤立發展狀態。近年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雖然恢復交往，但對於跨國界跨區域華文文學的研究仍做得很不够，因而古遠清的努力顯得很可貴。

東南亞一些國家六十年代以來，華文教育特別是華文高等教育受到極大壓制。在相當不利華文教育的情況下，華文文學的發展也相應陷入低潮。近年來，客觀環境雖然有了極大改善，但作為上層文化建築的東南亞華文文學仍然發展緩慢，這其中工商經濟迅速發展及功利主義之盛行，也是華文文學緩慢發展原因之一。尤其是對於文學評論及文學史料的編寫，更是走向低潮。

因此《古遠清自選集》的出版，將讓讀者對世界華文文學特別是中國兩岸三地及東南亞華文文學有深一層的認識。雖然這其中也有不少涉及文藝界的論爭，但是非曲直，讀者自會分析和判斷。正如洪英在《古遠清剪影》一文所說：古遠清在學術研究中注重論爭，所以他寫的港臺文學批評史，最精彩的部分便是文學思潮和文學運動、文學論爭部分。

古遠清的這本選集計 60 餘萬言，只屬他 400 萬言筆耕的一小部分。不過，他的這本自選集，對於想跨地域了解華文文學的讀者來說，無疑是非常有參閱價值的。尤其是“海外華文文學篇”中《中國 15 年來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走向》、《東南亞華文文學與臺港澳文學之比較》及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張中華副校長(左)向葉新田博士贈送禮品

《馬華文學研究在中國》等篇章，信息量大，對馬華文藝界來說更具參考價值。

古遠清長期默默耕耘，留下了豐碩的文學評論成果，在這功利主義盛行的年代，確是文學評論界的一個異數。他有今天的成就，除了他的工作環境優越，例如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屬於研究人員編制，是時間的富翁，還時常有機會出席國內外學術研討會以擴大視野外，還與他能認真嚴肅對待自己的著作，在學術研究方面能迎難而上及孜孜不倦的筆耕精神有關。今天他在馬來西亞出版的這本“自選集”，為世界華文文學奉獻出一束鮮花，相信此書對促進中馬文化交流尤其是文學交流，會起一定的作用。是為序。

2000年6月27日於吉隆坡

目 錄

為世界華文文學奉獻一束鮮花 葉新田 (VII)
——《古遠清自選集》序

臺灣篇

20世紀臺灣文學理論批評發展輪廓	(3)
大陸、臺灣、香港當代文學理論批評連環比較	(19)
臺灣文壇的“雙陳”大戰	(35)
蕭蕭先生批評大陸學者的盲點	(40)
——對《大陸學者拼貼的“臺灣新詩理論批評”圖》一文的回應	
兩岸是如何“爭奪”臺灣文學詮釋權的?	(46)
臺灣的“金學”研究	(51)
臺灣當代女評論家論	(56)
附：臺灣作家尤淑女的講評	
大陸去臺作家沉浮錄	(74)
“為政治而文學”的葉青	(74)
張道藩：右翼文藝政策的製定者	(81)
為右翼文藝鞠躬盡瘁的王平陵	(88)
胡秋原：從“自由人”到民族主義戰士	(97)
為魯迅作傳的鄭學稼	(110)
資深編輯出身的陳紀潛	(116)
劉心皇和他的新文學史研究	(120)
在新聞與文學領域馳騁的尹雪曼	(129)
被人檢舉為“文化漢奸”的紀弦	(137)
作為“自由派”作家的林海音	(143)
夏志清和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	(152)
於梨華：“冷凍”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裏	(157)

解除戒嚴後：臺灣詩壇的詭變	(160)
暗潮汹涌，明浪飛騰	(170)
——論戰不斷的 90 年代臺灣現代詩壇	

港澳篇

香港文學研究 20 年	(189)
20 年來香港文學在內地的傳播	(199)
“九七”前夕的香港文壇	(213)
’96～’97 年的香港文學批評	(223)
為重構香港文學多元化生態的努力和收穫	(232)
——’98、’99 的香港文學研究述評	
蹊徑獨闢，和而不同	(242)
——2000 年的香港文學研究	
勇踏“荒蠻” 毀譽參半	(252)
——評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	
作為文學評論家和研究家的劉以鬯	(260)
香港文學版圖中的“沙田文學”	(273)
余光中香港時期的文學評論	(280)
附：中國大陸的余光中評價之爭	
香港散文詩的都市風景線	(293)
香港傳記文學存在着、發展着	(300)
香港文學研究在香港	(305)
誰最有資格寫《香港文學史》？	(312)
要不要“重寫”《香港文學史》？	(314)
臺港澳文學學科尚未建立	(316)
澳門文學：昨天 今天 明天	(319)

大陸篇

蔣介石“策反”魯迅	(327)
——關於通緝魯迅近七年未被捕之真相	
50 年來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	(337)
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批評 40 年	(343)

建國 40 年來的詩歌理論批評景觀	(354)
“文革”前自由主義作家及其命運	(364)
姚文元“棍子”式批評及其特徵	(371)
打開歷史的黑箱	(380)
——文革“寫作組”探秘	
90 年代的文學批評特徵	(389)
破綻甚多的《中華文學通史》	(397)
謝冕的評論道路	(399)
關於《中國大陸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的對話	(405)
論余秋雨現在還不能“懺悔”	(413)
奉勸余秋雨三思而行	(417)
——質疑《〈新民周刊〉〈法制日報〉〈上海法制報〉聯合調查 余秋雨“文革問題”》	
余秋雨和“石一歌”	(423)
——“文革”匿名寫作研究之一	
張愛玲是“文化漢奸”嗎?	(429)
——與陳遼先商榷	
論詩詞的藝術魅力	(434)
——《留得枯荷聽雨聲》引論	
海外華文文學篇	
中國 15 年來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走向	(445)
東南亞華文文學與臺港澳文學之比較	(456)
馬華游記散文的感性與知性	(463)
馬華文學研究在中國	(468)
方修：馬華文學史研究第一人	(476)
魯迅精神在 50 年代的馬華文壇	(484)
——讀雲里風(馬來西亞)的散文	
尋找獨特的訴說方式	(489)
——評戴小華(馬來西亞)游記散文的“雙聲話語”	
蕉風椰雨譜新篇	(495)
——讀葉新田(馬來西亞)《山河在蘇醒》	

孟沙(馬來西亞)小說的藝術魅力.....	(498)
甄供(馬來西亞):具有魯迅風骨的雜文高手	(502)
文體的自覺.....	(505)
——論黃孟文(新加坡)的微型小說	
論夢莉(泰國)的散文.....	(511)
“一支感傷的流浪小調”.....	(517)
——評江一涯(菲律賓)的詩	
一位“尋夢者”的心路歷程.....	(523)
——讀王性初(美國)的詩	
“落地生根”與“葉落歸根”.....	(527)
——新春答客問	
附:“落地生根”與“葉落歸根”應加以區別的理由(潘亞歐)…	(529)

史料篇

發生在臺灣“戒嚴”時期的“文壇往事辨偽案”.....	(533)
——重評蘇雪林與寒爵、劉心皇“交惡事件”	
異議《中國作家大辭典》.....	(543)
附:哪個來出錢? (王泉根)	(547)
《中國新文學大系(1949—1976)史料·索引卷》獻疑.....	(549)
附:丁景唐、徐鍇熙給古遠清的覆信.....	(551)
請再多下一點“水磨功夫”.....	(553)
——《中華文學通史》當代文論卷史料匯釋	
請勿“補劃”右派.....	(557)
評論評論家要實事求是.....	(560)
——讀《朱塞和他的當代文學研究》一文有感	
寫“文革”回憶錄不應為贊者譁.....	(562)
——評胡錫濤《“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寫作組真相揭祕》	
文化名人傳記也要打假.....	(566)
——評“花城”版《余秋雨的背影》	
附:孫傳劍的來信	(572)
“相逢一笑泯恩仇”.....	(573)
——“兩岸作家臺北對話文學”散記	

附 錄

洪英：成果豐碩，後來居上.....	(579)
——古遠清剪影	
(臺灣)劉菲：有朋自大陸來	(582)
(吉隆坡)陳耀星：清高脫俗一儒生	(587)
古遠清年表.....	(590)
後記.....	(594)

臺灣篇



作者在臺灣“中國文藝協會”作演講(1995年)

20世紀臺灣文學理論批評發展輪廓

在異民族統治下艱難起步

臺灣新文學理論批評，如果從 20 世紀的 20 年代算起，已有 80 年的歷史。對這段歷史加以劃分，從 20 年代至 1945 年是一大階段，1945 年後是一個新起點。

前一階段為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後一階段為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其中 20 年代為“前現代”，這一階段因受祖國五四文學的影響，臺灣文學界對大陸所發生的文學革命有相當的認同感。以張我軍為代表的大陸留學生，發表《新文學運動的意義》⁽¹⁾、《糟糕的臺灣文學界》⁽²⁾等文章，努力引進內地的文學革命理論，提出“白話文學的建設，臺灣語言的改造”的響亮口號，並在《臺灣民報》轉刊胡適、魯迅、冰心、郭沫若等人具有濃厚時代精神的作品，以彌補由於甲午戰敗，清廷割臺，當 1917 年新文學發軔時，臺灣已被日本人統治達 20 餘年之久所帶來的對大陸新文學認識不足的缺陷。

不過，這種基於不可否認的歷史文化與血統淵源的優良傳統，不久便受到毀滅性破壞。在 1937 年戰爭時期，漢文被臺灣總督府廢除。在日本軍閥的高壓統治下，臺灣作家和評論家高舉民族運動的大旗，寫了不少文章抵制、反對日本的殖民文化。

作為一個孤懸海外的小島，臺灣長期受異民族的統治，故其文化特徵與中國文化在共同性之外，容易產生另一種差異性。於是便有本土化意識的萌發，如黃石輝和郭秋生所發動的回歸母語文學的“臺灣話文”與“鄉土文學”運動。這時所發生的臺灣話文派與白話文派的磨擦，不過是左翼文學陣營內不同語文策略的爭論，並非像有的論者說的是所謂“漢族沙文主義”與臺灣“自主派”之爭。

1945 年日本投降後，臺灣新文學界從“皇民文學”的陰影籠罩下解放出來。在短短的時間裏，呈現了重建臺灣新文化的氣象。這時，不管是在日據時代已成名的作家，或是從祖國大陸回臺用漢文書寫的作家，或隨國民政府入島接收政權的少數大陸作家，都對臺灣文學的建設抱有極大的期待。尤其是本土作家楊逵的論述，有敏銳的政治嗅覺和清醒的認識。他強調臺灣文學的中國屬性，堅決反對“臺灣獨立”、“臺灣托管”以及為美國和日本外來勢力服務的“奴才文學”。這裏還不應忽視大

陸作家范泉在上海發表的《論臺灣文學》⁽³⁾。此文表現了大陸文學評論家對臺灣人民和臺灣文學的深切關懷。范泉認為：“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不可分的一環”，並主張臺灣新文學發展的主體是本土作家，只有依靠他們才足以建設有“臺灣作風與個性”的臺灣新文學。也只有重視本土作家的作用，才能真正把臺灣新文學的特殊性與中國新文學的一般性的矛盾統一起來。范泉這一論述，為 1948 年《新生報》“橋”副刊上展開的如何建設臺灣新文學的討論，敲定了主旋律。在討論中，許多人強調建立臺灣新文學必須與祖國大陸文學緊密聯繫⁽⁴⁾；要堅持新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要注意省內外作家的團結、合作。有的論者還把 30 年代上海左翼文學理論引進到臺灣。這場討論使原來從事日文創作的作家，認識到建設臺灣新文學必須重新掌握漢語言文字寫作的重要性。論爭活躍了臺灣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不足之處是未能主動聯繫大陸去臺的評論家如臺北師範學院的呂熒和臺灣大學的錢歌川、臺靜農以及李何林，讓他們在這場論爭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不幸的是二、二八事變發生後，臺灣政局惡化，作家和評論家處境愈來愈艱難，不少人只好匆匆西渡大陸避禍。

文學獨斷與獨霸的 50 年代

1949 年 4 月 6 日，《新生報》“橋”副刊編輯史習校（歌雷）在白色恐怖中深陷囹圄，積極參加論爭的臺大學生孫達人及其他進步學生 20 餘人也被捕。此“四六”事件發生後，“橋”副刊時代的文學活動劃上了句號。接着，臺灣省主席陳誠 5 月 20 日發布“全省戒嚴令”。同年 11 月，國民黨中宣部代部長任卓宣（葉青）來臺。隨他前後而來的沒有一位是一流作家，只有頂多是二流作家的梁實秋、胡秋原、蘇雪林、王平陵等少數人。在當局的鐵腕政策下，絕大部分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家作品皆因“附匪”或“陷匪”而被查禁，新文學與新文化傳統差點被中斷。原來具有強烈反共意識的作家及鄙視五四傳統的軍中青年，再加上從政治上支持國民黨的傅斯年、胡秋原等自由派知識分子，一同被官方拉入“反共抗俄”文藝前沿。“展開戰鬥，反擊敵人”，“配合戰鬥！配合建設！配合革命！……暴露敵人！暴露奸細！”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這時的文學理論批評被緊緊地捆綁在政治戰車上。評論家們的文章，差不多都是以僵化的形式宣傳“戰鬥文藝”，大論特論“文藝作戰與反攻”的政治功能，以及三民主義如何需要文學，文學如何需要三民主義，外加三民主義文學的內容與形式一類的政治說教，失却了評論家的獨立見解與富有個性

的語言。張道藩發表的《論當前自由中國文藝發展的方向》⁽⁵⁾、《三民主義文藝論》⁽⁶⁾，便典型地體現了“工具論”的文學觀及政治干預文藝的特點。葉青的《三民主義與文學》⁽⁷⁾、趙友培的《思想戰鬥與文藝戰鬥》⁽⁸⁾、王集叢的《怎樣展開戰鬥文藝運動》⁽⁹⁾、葛賢寧的《論戰鬥的文學》⁽¹⁰⁾，同樣在宣稱這是一種從文學一元走向文學獨斷和獨霸的時代。

這種一元和獨斷，在政治上是三民主義意識形態的獨霸；在文學觀念上是蔣介石《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的詮釋和發揮；在創作觀念上，則是“戰鬥文藝”的一統天下。1955年1月，蔣介石正式出面倡導“戰鬥文藝”。1956年1月，國民黨中常會通過的“展開反共文藝戰鬥工作案”，就是政治主宰文學話語的典型表現。它不僅把文學創作變成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反共八股，而且把文學評論變成政治獨白的轉達形式。這就難怪壟斷文壇的大軍為政界及軍界所組成的官方作家及評論家。這枝“筆部隊”所寫的文藝評論，最基本的特徵就是使文學蛻化為政治的工具，成為高度統一的“反共抗俄”的政治獨白和“除三害”運動的演繹，由此形成一個為三民主義中心意識形態所覆蓋的封閉性系統。但也有衝破這一模式的，如胡適在1958年5月4日的一次演講中，正式扯起“人的文學”與“自由的文學”兩面大旗⁽¹¹⁾，和當局的獨裁政治與“戰鬥文藝”的一元論相抗衡。此外，紀弦於1956年1月15日組織現代派，提出“推行新詩的現代化”口號，也說明作者的文學觀和價值觀與主流話語在疏遠。夏濟安的《評彭歌的〈落月〉兼論現代小說》⁽¹²⁾，與文化專制形態下的文學範式也大異其趣。

向西天取經的 60 年代

臺灣 50 年代的文論基本上還是大陸三、四十年代右翼文論的延伸，受張道藩《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及葉青的三民主義論述影響較大。真正為區域性文論特點的形成作出貢獻的，是那些面對着無根與放逐的新情況，一批從夏濟安與吳魯芹等人創辦的《文學雜誌》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作家和評論家。以他們的身份和地位，不會再滿足於“想當年”的反共懷鄉文學創作及其衍生的文學批評，認為那是一種癱瘓和僵化的心理體現。出於對臺灣文學發展前途的關心，他們要打破“戰鬥文論”所壟斷的局面，要開創海洋文化的新局面，創造出新的藝術形式的作品及其迥異於“三民主義文學”的理論批評。他們於 1960 年創辦的《現代文學》雜誌，在《發刊詞》中強調“向近代的西方文學作品、藝術潮流和批評思想借鑒”。

這一階段，最活躍的評論家不再出自政界和軍界，而是來自學院的大牆之內。《現代文學》一創刊，就利用臺灣大學外文系海洋文化的資源優勢，推出《卡夫卡特輯》，除介紹喬埃斯、勞倫斯、吳爾芙、福克納、貝特等歐美現代作家外，還將存在主義、意識流、超現實主義以及反小說等各種新思潮、新學說注入被意識形態所籠罩的臺灣文壇。

夏濟安是現代文學的先行者。他這一時期寫的《魯迅作品的黑暗面》⁽¹³⁾，把文學評論的焦點從宣揚官方意識形態轉移到文本細讀與文體研討，是當代臺灣文學研究以政治為本位向文學本體論轉移的最新實驗。王夢鷗 1964 年出版的《文學概論》⁽¹⁴⁾，明顯受西方新批評觀念的影響，但不是韋勒克與沃倫合著的《文學原理》(1942)的簡單移植或改寫，而是企圖融貫中西文論，有自己的體系和見解，極適合中文系學生使用。

在 60 年代，臺灣學術界掀起了一股美學研究熱潮。資深學者徐復觀的《中國藝術精神》⁽¹⁵⁾，便是一部影響深遠的著作。徐復觀所講的“藝術精神”，其實就是美學。此書是臺灣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首次出現的有關中國美學的專著。其中還運用了不少從日文裏轉譯過來的西洋美學理論作參照系，用於作中西美學比較。和《中國藝術精神》不同的是，姚一葦的《藝術的奧秘》⁽¹⁶⁾不以中國而以西方美學為主要研究對象，相同的是仍沒有在書名上標出美學。真正以美學作書名的，是趙天儀的《美學引論》⁽¹⁷⁾及劉文潭的《現代美學》⁽¹⁸⁾和後來陸續推出的《西洋美學與藝術批評》。

但這時期的美學研究，未能很好做到洋為中用。除徐復觀外，大多是研究西洋美學多於研究中國美學。其他的研究文章，着重探討某一方面的問題，顯得零碎而不系統。本來，文學理論研究在臺灣是薄弱環節；對美學的研究，還處在起步階段，且不說有堆砌史料的現象，有的還有抄襲西洋文論的嫌疑。而一些論者把談藝術技巧的文章均列入美學理論，更使得真正的美學研究顯得寂然無聲了。

新詩批評在這一階段顯得特別活躍。那些在大陸受過不完全教育的流亡學生中成長起來的青年詩人，勇於皮相式的推翻前輩建立的傳統，朦朧龐朧地醉心於存在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等西方各種文藝潮流。由於山頭主義盛行，詩壇上不斷爆發“私人戰爭”。通過論戰，對現代詩的本質及特徵加深了研究，如洛夫對余光中《天狼星》的批評與余光中的反批評⁽¹⁹⁾。小說評論雖有些滯後，但仍有力作，如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²⁰⁾。此書最大的特色是不同於大陸 50 年代出版的附屬於中國現代革命史的《中國新文學史》，而是把首要工作放在“優美作品之發現

與評審”⁽²¹⁾上。雖然夏志清評審時也有自己的政治偏見和框框，但與王瑤、劉綏松同類著作相比較，夏氏發現與重視被大陸革命文學史家拒排的張愛玲、錢鍾書等人。此外，該書對茅盾《子夜》侷限性的分析、對老舍後期作品的看法、對丁玲作品的褒貶、對趙樹理方向的質疑……，均開了大陸“重寫文學史”的先河。

在 60 年代也有另類文學主張和聲音。如 1966 年由尉天驥、陳映真等人創辦的《文學季刊》，便對現代主義文學所表現的脫離現實的現象提出懷疑和批判。他們這樣做是為邁向新的“在臺灣的中國文學”掃清路障。

左翼文學論述抬頭的 70 年代

70 年代以後，《文學雜誌》引入的“新批評”觀念，在《中外文學》創刊後得到蓬勃發展。

學院派批評家在這一階段同樣是批評的主力軍，其佼佼者為時任臺灣大學外文系主任的顏元叔。他連續推出的 7 本論文集和《西洋文學批評史》等譯作，使他不僅成為“民族文學”、“社會寫實文學”的積極提倡者，也成了第二代“新批評”的發言人。他出於建立海洋文化的需要，推崇艾略特，和那些只強調社會學批評而排斥心理學批評和不重視結構分析的評論家不同，對歐美“新批評”的“本體批評”、“內部研究”有強烈的興趣。他將其引進的目的是衝擊多年流行的偏重於文學外部關係的傳統批評方法。在 60、70 年代之交，他對一些重量級詩人在結構與意象運用方面所作的毛病診斷，對白先勇、王文興小說獨具眼光的分析以及對於梨華不留情面的指摘，均說明他所從事的是真正嚴肅的學術研討。正如呂正惠所說：他是“開創了學院研究臺灣當代文學現象的第一人”⁽²²⁾。柯慶明走的是另一條純理論研究路線。他的《文學美綜論》⁽²³⁾所建構的“以生命意識為中心的文學理論”，表明了作者與衆不同的文學觀念及其研究方法。

臺灣經濟的起飛，和蔣經國政治與經濟落實於本土的做法分不開。它同樣為鄉土文學的滋生提供了溫床。60 年代中期創刊的《臺灣文藝》與《笠》，在 70 年代繼續紮根本土，着眼於鄉土情懷，提倡書寫現實人生，糾正了現代主義者所倡導的“橫的移植”⁽²⁴⁾的偏頗。以新的面貌出現的《文季》，無論是創作還是評論，均強調作家必須置身於現實生活之中，以便體驗這時代帶給他的痛苦和歡樂，把讀者從有限的個人空間帶到另一個更寬廣的世界。